

# 认知促进还是认知负担：早期二语学习与幼儿全面发展研究述评

孙庆泽

曲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山东 曲阜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25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3日

## 摘要

在全球化与学前外语教育普及的背景下，幼儿早期第二语言学习究竟带来认知与社会性发展优势，还是构成额外认知负担，已成为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核心议题。本文系统梳理关键期假说、双语抑制控制理论等核心理论框架，整合近年实证研究与元分析证据，总结早期二语学习对幼儿执行功能、元语言意识、情绪理解、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影响效应，并对发表偏倚、社会经济地位混淆等方法学问题进行评述。文章重点分析起始年龄、语言熟练度、教学模式等调节变量，指出我国本土化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应开展大样本纵向追踪及神经机制研究。本文从政策、幼儿园、家庭三个层面提出具体建议，旨在为学前英语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 关键词

早期二语学习，执行功能，元语言意识，幼儿全面发展，社会经济地位

# Cognitive Enhancement or Cognitive Burden: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Early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Holistic Development in Young Children

Qingze Sun

School of Psychology,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Received: April 22, 2026; accepted: May 25, 2026; published: June 3, 2026

##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preschool foreign language

文章引用：孙庆泽(2026). 认知促进还是认知负担：早期二语学习与幼儿全面发展研究述评. *心理学进展*, 16(6), 1-8.  
DOI: 10.12677/ap.2026.166286

education, whether early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young children fosters cognitiv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r imposes additional cognitive burdens has become a central issue in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key theoretical frameworks such as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and the bilingual inhibitory control theory, integrates recent empirical research and meta-analysis evidence, summarizes the effects of early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n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s,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social cognition, and evaluates methodological issues such as publication bia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confounding. The study focuses on analyzing moderating variables including age of onset,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teaching models, identifies gaps in localized research in China, and proposes future studies involving large-scale longitudinal tracking and neural mechanism research.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are provided from three levels—policy, kindergarten, and family—to offer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reschool English education.

## Keywords

Early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Executive Function,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Socioeconomic Statu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早期双语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学前教育领域的重要实践方向。据估计，掌握双语或生活在双语环境下的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Bialystok, 2017)。我国《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2)明确强调，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关键时期，幼儿语言的发展贯穿于各个领域，也对其他领域的学习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幼儿园与家庭将英语启蒙纳入早期教育，幼儿早期二语学习呈现低龄化、普及化趋势。

然而，与这一趋势伴随的是持续未决的学术争议。以Bialystok为代表的研究者提出经典双语优势假说，认为双语经验长期训练个体的抑制控制与认知转换能力，进而带来领域一般认知增益(Bialystok, 2017)。但近年多项元分析显示，双语优势效应量微弱、难以重复，且易被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混淆(Gunnerud et al., 2020; Lowe et al., 2021)。对于3~6岁幼儿而言，其认知基础与成人存在本质差异，直接套用成人研究结论缺乏生态效度。这些发现表明，传统共识正在面临挑战，引发“双语优势是否真实存在”的激烈争论。因此，立足幼儿发展规律，系统厘清早期二语学习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本文围绕幼儿早期二语学习对认知与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展开综述，界定核心概念，梳理经典理论，整合执行功能、元语言意识、情绪理解、社会认知等指标的实证证据，评述争议焦点与边界条件，并聚焦中国本土化研究现状提出未来方向与教育启示。本文旨在为学前双语教育提供科学依据，回应实践中“是否学、何时学、如何学”的现实问题，特别是针对我国当前“英语启蒙低龄化”趋势中存在的焦虑与非理性现象，尝试提出基于现有证据的“适宜性”干预路径，以服务于幼儿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早期二语学习指幼儿在3~6岁期间，以非母语为目标的顺序性语言学习，区别于出生即接触两种语

言的同时性双语(王瑞明, 201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中国当前“早期二语学习”多属于顺序性学习(如幼儿园开设英语课程、家庭进行英语启蒙), 其认知负荷机制可能与移民背景下的自然双语习得不同。后者属于情境性双语环境, 幼儿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接触两种语言; 而前者通常表现为有限的课堂输入与有意识的教学活动, 输入强度和自然性均存在差异。早期二语学习以口语输入、情境感知、游戏化互动为主, 强调兴趣培养与语感建立, 而非系统语法与词汇训练。

幼儿全面发展在本研究中包含三个核心维度: 认知发展(执行功能、注意力、问题解决)、情绪发展(情绪理解、情绪调节)、社会性发展(观点采择、合作行为、跨文化态度)。这一框架依据《伯克毕生发展心理学》对幼儿发展阶段的经典划分。

执行功能是幼儿核心高级认知能力, 包含三个子成分: 抑制控制(抑制优势反应)、工作记忆(维持与操作信息)、认知灵活性(在规则与维度间灵活转换)(Miyake et al., 2000)。元语言意识指个体对语言形式、结构、符号任意性的反思与觉知(Bialystok, 2001), 是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衔接指标。

## 2.2. 主要理论

关键期/敏感期假说由 Lenneberg (1967) 提出, 认为 2~12 岁是语言发展的生物关键期, 此阶段大脑可塑性高、语音感知灵敏, 语言习得更轻松自然。廖国海(2022)指出, 语言关键期已从“绝对临界”转向“敏感期”视角, 即幼儿期存在语言学习优势, 但并非唯一窗口期, 为早期二语学习的适宜性提供了发展依据。

双语抑制控制理论(Bialystok, 2017)认为, 双语者需持续抑制非目标语言, 这种长期练习会强化注意力控制与冲突监控能力, 进而产生跨领域认知增益。该理论是双语优势最核心、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框架。

双重机制理论(Green, 1998)指出, 双语加工依赖“语言选择模块”与“执行控制模块”的协同运作, 两种语言的竞争、选择与调节持续调用执行功能相关资源, 促进认知控制能力的发展与重塑。Green & Abutalebi (2013)进一步提出适应性控制假说, 指出语言监控与切换需求根据情境动态调整。该理论从认知加工层面解释了双语经验如何转化为稳定的认知优势, 与抑制控制理论共同构成双语认知研究的核心理论支撑。

上述理论共同构成早期二语学习研究的基础: 关键期假说提供发展阶段依据, 抑制控制理论与双重机制理论解释认知增益的内在机制, 为本综述的实证梳理与批判奠定完整理论框架。

## 3. 早期二语学习对幼儿认知发展的影响

### 3.1. 对执行功能的潜在关联

大量研究提示, 早期二语学习可能与幼儿执行功能的某些成分存在积极关联, 其中抑制控制与认知灵活性的证据相对较为一致。Tran 等人(2018)发现, 双语幼儿在冲突任务中反应更快、错误率更低。Carlson & Meltzoff (2008)采用维度变化卡片分类任务发现, 双语儿童认知灵活性表现出一定的优势, 在规则转换与维度切换中表现更优。

国内研究同样倾向于支持双语执行功能可能存在一定优势。李君等人(2023)以汉语学龄儿童为被试发现, 二语学习对认知控制可能存在一定促进作用, 且年龄与二语熟练程度共同调节效应大小, 为幼儿期开始的二语学习效应提供了早期证据。总体而言, 抑制控制与认知灵活性是双语研究中报告较多、相对较为一致的认知指标, 但这些发现主要基于相关性和横断研究, 其因果关系尚需谨慎解读。

### 3.2. 对工作记忆的影响: 争议与不确定性

与抑制控制不同, 早期二语学习对工作记忆的效应并不稳定, 表现出显著的任务依赖性。Lowe 等人

(2021)的元分析未发现双语儿童在工作记忆上的显著优势。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表明,在低认知负荷的工作记忆任务中,双语与单语儿童通常表现无差异;而在高负荷或需要同时进行抑制控制的任务中,差异才可能出现。幼儿工作记忆容量有限,二语输入在初期可能占用额外认知资源,导致增益不明显甚至出现短暂劣势。因此,工作记忆尚不构成早期双语学习稳定的认知红利,其效应仍需更多严谨研究验证。

### 3.3. 对元语言意识的可能促进效应

现有证据倾向于认为,双语经验可能促使儿童从“关注语言意义”转向“同时关注语言形式”,进而与元语言意识水平存在积极关联。Bialystok (2001)发现,双语儿童在符号任意性任务中表现优于单语儿童,能够更快理解“词语与其指代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幼儿在两种语言的对比中更容易理解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音结构差异与词汇构成规则,进而可能促进语音意识、词汇意识与句法意识发展。何文广和陈宝国(2011)指出,元语言意识的提升不仅有利于二语习得效率,还能正向迁移至母语加工、早期阅读与符号思维发展,成为连接语言学习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桥梁。需要指出的是,该领域研究同样面临样本选择与混淆变量的挑战,上述关联的稳健性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 3.4. 对注意力与问题解决的潜在积极关联

部分研究表明,早期二语学习可能为幼儿提供持续的冲突监控与注意力调节练习,有研究发现其与持续性注意与选择性注意水平存在积极关联。Bialystok (2017)综述指出,双语者在需要忽略无关信息的注意任务中表现更优。另有研究提示,在问题解决任务中,双语儿童表现出更强的规则发现能力与视角转换能力,能够更快摆脱思维固着,采用相对更灵活的策略完成任务。这种优势在非语言任务中同样有所体现,被部分研究者视为支持双语优势具有领域一般性假设的证据之一,也为早期二语学习促进一般认知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

## 4. 早期二语学习对幼儿情绪与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 4.1. 情绪理解与情绪调节能力提升

初步证据显示,二语学习与情绪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密切联系。任佳鸿和王速(2020)指出,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混合情绪理解呈显著正相关,语言能力越强的幼儿越能理解同时存在两种不同情绪的情境。有理论认为,二语学习为幼儿提供更丰富的情绪标签、情绪情境与情绪表达规则,帮助其更精准地识别、描述与调节自身及他人情绪。在双语环境中,儿童需要适应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规范与情绪表达习惯,这或许有助于提升情绪觉知、情绪评价与情绪调控策略,减少冲动反应与负性情绪体验,对情绪健康发展产生潜在积极影响。

### 4.2. 观点采择与社会认知的潜在促进

部分研究提示,双语经验可能促进社会认知发展。Greenberg 等人(2013)发现,双语儿童在观点采择任务中表现相对更好,能够更快从他人视角进行推理,理解信念、愿望与外部行为的关系。这一发现的解释机制在于:双语经验让儿童更早意识到“同一事物可被不同符号表征”,这种符号意识可迁移至社会认知领域,促进心理理论与观点采择能力发展(何文广,陈宝国,2011)。此外,有研究指出,双语儿童在合作任务中更愿意主动沟通、协商与互助,合作行为的频率与质量可能更高(Byers-Heinlein et al., 2017),社会适应能力更强。

### 4.3. 跨文化态度与包容性发展

早期二语学习不仅是语言技能的学习,更是文化经验的学习。Byers-Heinlein 等人(2017)发现,双语

婴儿在面对不同语言背景的说话者时表现出更积极的社会偏好，提示语言经验可能从婴儿期开始塑造社会态度。接触不同语言体系的幼儿，更容易接纳文化差异、尊重多元表达，形成更开放、包容的社会态度。双语环境可降低外群体偏见，提升文化共情与跨文化理解能力，为未来跨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入奠定社会性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方文化对情绪表达规范存在差异，中国幼儿在学习英语时是否因文化冲突而面临额外的情绪理解复杂性，尚需进一步研究。尽管该领域实证研究仍相对有限，但这种社会性增益对幼儿长期社会性发展与人格健全可能具有潜在积极价值。

## 5. 双语优势的争议、边界条件与方法学批判

### 5.1. 元分析证据：效应微弱且难以重复

双语优势假说在近年受到强烈挑战与系统性批判。de Bruin 等人(2015)指出双语研究存在显著发表偏倚，阳性结果更容易被发表与传播。Gunnerud 等人(2020)的大规模元分析发现，传统报告的双语认知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地位混淆，剔除 SES 影响后效应量显著减弱且主要集中在中高 SES 样本中。Lowe 等人(2021)的元分析同样未能重复稳定的双语优势，效应量极小，发表偏倚校正后趋近于零。上述证据提示，传统双语优势可能被过度夸大，并非普遍存在的绝对效应。

### 5.2. 关键混淆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与样本偏差

社会经济地位(SES)是双语研究中最主要、最具影响力的混淆因素。高 SES 家庭更可能提供优质二语输入、丰富教育资源与高浓度认知刺激，所谓“双语优势”本质上可能是 SES 优势(Gunnerud et al., 2020)。此外，现有研究样本多集中于城市中高 SES 家庭，农村、流动儿童及低 SES 群体代表性不足，样本同质性限制了结论的外部效度。家庭语言环境、父母受教育水平、教学质量、二语熟练度、性别与气质差异等，均会显著调节双语效应的方向与大小。忽视混淆变量的研究难以得出可靠结论。

### 5.3. 语言熟练度阈值与认知负荷的条件

一个重要但常被忽视的问题是语言熟练度阈值的作用。许多研究未区分“初学者”与“熟练者”，将不同熟练度的双语者混为一谈。现有资源竞争模型暗示，只有当二语水平达到一定阈值、实现自动化加工时，认知红利才可能出现。若二语水平较低，语言加工仍需消耗大量控制性资源，此时不仅无法产生认知增益，反而可能因资源竞争而转化为“认知负担”。这一观点被称为“熟练度门槛假说”，目前仍处于理论推演阶段，亟需更多实证检验。

此外，当输入强度过高、教学方式机械枯燥、任务难度超出幼儿当前发展水平时，二语学习同样会转化为认知负荷，占用幼儿有限的认知资源，干扰母语发展、注意力维持与情绪状态。低质量、高强度、功利化的双语启蒙，甚至可能降低学习兴趣，引发焦虑、挫败与回避行为，对长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王瑞明, 2015)。因此，区分“促进性双语输入”与“负荷性双语输入”至关重要。

### 5.4. 关键调节因素整合

综合上述争议，需要强调的是，双语效应并非普遍存在，其发生依赖于以下条件：第一，起始年龄：幼儿期优于学龄期，但并非越早越好，需匹配认知发展水平；第二，语言熟练度：优势出现在达到基本熟练度阈值之后，即稳定、可理解、有意义的输入条件下；第三，教学方式：游戏化、情境化、低压力模式显著优于机械训练；第四，环境支持：家庭与幼儿园协同、语言输入一致、文化氛围友好。脱离调节因素空谈“双语优势”不具备科学与实践价值。

## 6. 中国本土化研究现状、未来方向与教育启示

### 6.1. 国内研究现状：进展与不足

我国幼儿早期二语学习研究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整体呈现“重认知、轻社会性”“横断多、纵向少”“城市多、基层少”的特点。何文广和陈宝国(2011)较早对双语认知优势效应进行系统述评，梳理理论脉络与实证证据，推动国内双语认知研究开展。廖国海(2022)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键期假说的理论演变，为国内早期二语学习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整合视角。吴国婧等人(2022)探讨学前期儿童执行功能与语言的双向关系，并揭示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为本土化研究提供重要方法与数据参考。李君等人(2023)聚焦汉语背景儿童，提供了本土行为证据，推动研究结论更贴合我国幼儿发展现实。

但国内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第一，多数研究仅关注执行功能等单一认知指标，对情绪理解、合作能力、社会认知等全面发展维度的系统性探究匮乏，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脱节；第二，样本多集中于城市公立幼儿园，农村、流动儿童、不同 SES 群体代表性不足，结论推广受限；第三，横断研究居多，缺乏长期追踪设计，难以揭示双语学习的发展轨迹与长期效应；第四，教育干预研究极少，难以为幼儿园与家庭提供可操作、可复制的实践方案；第五，对汉语—英语语言距离、文化差异等本土化议题挖掘不深，理论创新与国际对话能力有待提升。

### 6.2. 本土化理论思辨：语言距离、文字系统与文化差异

汉语与英语分属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在语音、正字法、形态句法及语用规范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较大的“语言距离”可能对幼儿元语言意识与认知负荷产生双向调节作用。在语音层面，汉语为声调语言，英语为重音—节律语言，二者差异可能提升幼儿对语音结构的敏感性，但也可能因语音范畴不匹配而增加早期感知负荷。在文字系统层面，汉语为意符文字，英语为字母文字，接触两类系统的幼儿可能在符号任意性理解与形—音匹配策略上发展出不同路径，理论上既可能增强符号灵活性，也可能干扰早期识字能力的自动化加工。此外，文化规范差异同样不可忽视：汉语文化强调集体主义与间接表达，英语文化更倾向于直接性与个人观点外露，幼儿在学习英语过程中可能面临情绪表达规范的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可能拓宽情绪理解的维度，另一方面也可能在情绪调节策略上引发混淆。未来本土化研究应系统检验上述理论假设，以构建更具生态效度的双语发展模型。

### 6.3.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应重点推进三类高质量本土化研究：一是大样本、多中心、纵向追踪研究，严格控制 SES、家庭语言环境、教学方式等混淆变量，系统描绘 3~6 岁双语学习的发展轨迹与关键转折点；二是本土化教育干预研究，开发游戏化、情境化、适宜幼儿发展的双语课程模式，检验生态效度与可持续效益，打通研究与实践的壁垒；三是多方法整合研究，结合行为测验、自然观察、问卷评估，兼顾认知、情绪、社会性多维指标，特别是引入多模态神经影像技术(如眼动追踪、功能性近红外光谱 fNIRS)，从大脑激活模式与神经可塑性层面，揭示早期二语学习对执行功能网络的实时影响机制。同时，应加强汉语背景下的理论建构，回应国际学术争议，提升本土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与实践价值。

### 6.4. 学前双语教育实践建议

政策层面，应出台科学、适宜、非功利化的学前双语教育指导意见，明确防止超前教学、机械训练与应试化导向，坚持以兴趣培养、全面发展为核心目标，保障双语教育的适宜性与科学性。幼儿园层面，加强教师双语教学素养与发展适宜性教育培训，优先采用 TPR、游戏、绘本、儿歌、情境互动等低负荷、高趣味方式，保证语言输入可理解、强度适宜、过程快乐，避免认知过载。教学应遵循“听说优先、读写

随后”的原则，重点培养语音意识和口语交际能力。家庭层面，引导家长理性看待早期英语学习，摒弃攀比与焦虑心态，以兴趣培养为主，营造轻松、支持、生活化的双语环境(如播放英文儿歌、共读英文绘本、进行简单日常对话)，协同幼儿园促进幼儿认知、情绪与社会性健康发展。

## 7. 结论

早期二语学习对幼儿全面发展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有益”或“有害”，而是依赖于学习起始年龄、输入质量、教学方式、环境支持与个体差异的条件性效应。现有证据提示，在适宜、适度、高质量条件下，早期二语学习可能与幼儿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元语言意识、情绪理解与观点采择能力存在积极关联；但在高强度、低质量、功利化模式下，则可能转化为认知负荷，干扰正常发展。现有研究在发表偏见、SES 混淆、样本同质性等方面存在方法论局限，需谨慎解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双语优势的出现可能存在“熟练度门槛”，只有达到一定二语水平后才可能出现认知增益。需要强调的是，当前多数证据以相关性和横断研究为主，因果关系的确立仍需更多大样本纵向追踪及严格控制的干预研究加以验证。我国本土化研究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需加强纵向、大样本、干预设计及神经机制研究，为学前双语教育提供更坚实的科学依据，最终服务于幼儿健康、全面、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何文广, 陈宝国(2011). 语言对认知的影响——基于双语认知“优势效应”的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19(11), 1615-1624.
- 李君, 王悦, 陈夏妮, 李莹(2023). 二语学习对汉语学龄儿童认知控制与词汇通达的作用——年龄和二语熟练程度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39(2), 219-227.
- 廖国海(2022). 国内外关键期假说研究的现状、趋势和展望.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5(4), 151-154.
- 任佳鸿, 王速(2020). 5-6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相关性研究.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36(4), 7-16.
- 王瑞明(2015). *第二语言学习与认知*. 科学出版社.
- 吴国婧, 程雪林, 李叶, 白荣, 邢淑芬, 李玉华(2022). 学前期儿童执行功能和语言的双向关系: 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 *心理发展与教育*, 38(2), 186-194.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2).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Bialystok, E. (2001). *Bilingualism in Development: Language, Literacy,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alystok, E. (2017). The Bilingual Adaptation: How Minds Accommodate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3, 233-262. <https://doi.org/10.1037/bul0000099>
- Byers-Heinlein, K., Behrend, D. A., Said, L. M., Girard, A., & Poulin-Dubois, D. (2017). Bilingualism Increases Social Flexibility in Infants. *Infancy*, 22, 525-542.
- Carlson, S. M., & Meltzoff, A. N. (2008). Bilingual Experience and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 Young Children. *Developmental Science*, 11, 282-298. <https://doi.org/10.1111/j.1467-7687.2008.00675.x>
- de Bruin, A., Treccani, B., & Della Sala, S. (2015). Cognitive Advantage in Bilingualism: An Example of Publication Bia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 99-107.
- Green, D. W. (1998). Mental Control of the Bilingual Lexico-Semantic System.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 67-81. <https://doi.org/10.1017/s1366728998000133>
- Green, D. W., & Abutalebi, J. (2013). Language Control in Bilinguals: The Adaptive Control Hypothesis.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25, 515-530. <https://doi.org/10.1080/20445911.2013.796377>
- Greenberg, A., Bellana, B., & Bialystok, E. (2013). Perspective-Taking Ability in Bilingual Children: Extending Advantages in Executive Control to Spatial Reasoning. *Cognitive Development*, 28, 41-50. <https://doi.org/10.1016/j.cogdev.2012.10.002>
- Gunnerud, H. L., Ten Braak, D., Reikerås, E. K. L., Donolato, E., & Melby-Lervåg, M. (2020). Is Bilingualism Related to a Cognitive Advantage in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6, 1059-1083. <https://doi.org/10.1037/bul0000301>
- Lenneberg, E. H. (1967).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Wiley.
- Lowe, C. J., Cho, I., Goldsmith, S. F., & Morton, J. B. (2021). The Bilingual Advantage in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ing Is Not Related to Language Statu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Science*, 32, 1115-1146.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21993108>

Miyake, A., Friedman, N. P., Emerson, M. J., Witzki, A. H., Howerter, A., & Wager, T. D. (2000).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Complex “Frontal Lobe” Tasks: A Latent Variable Analysis. *Cognitive Psychology*, *41*, 49-100. <https://doi.org/10.1006/cogp.1999.0734>

Tran, C. D., Arredondo, M. M., & Yoshida, H. (2018). Early Executive Functio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and Bilingual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73*, 200-218.